

社會學叢書

科技時代的心靈

——工業社會的社會心理問題

Arnold Gehlen 著

何兆武 何 冰 合譯

顧 忠 華 校訂



Arnold Gehlen 著
何兆武 合譯
何冰
顧忠華 校訂

科技時代的心靈

——工業社會的社會心理問題

 巨流圖書公司印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科技時代的心靈：工業社會的社會心理問題 /
Arnold Gehlen著；何兆武，何冰合譯，-- 一
版，-- 臺北市：巨流，民82
面；公分
譯自：Man in the age of technology
含索引
ISBN 957-9464-92-8（平裝）

1. 工業社會學

545.2

82003024

民國83年1月一版一印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科技時代的心靈

—工業社會的社會心理問題

著者：Arnold Gehlen

譯者：何兆武·何冰

校訂者：顧忠華

編輯：吳琍琍

發行人：熊嶺

出版者：巨流圖書公司

地址：100 臺北市博愛路25號312室

電話：(02)371-1031 314-8830

郵購：郵政劃撥戶01002323

傳真：(02)381-5823

國際書號：ISBN 957-9464-92-8（平裝）

出版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045號

定價：台幣180元

Man in the Age of Technology

國際中文版授權 ©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

Copyright © 1980.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Rowohlt Verlag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2. Chu Liu Book Company

目 錄

中譯本序 1

前 言 3

第一章 人與技術 13

有機物及其代替品 13

近代：它的上層建築 21

超自然的技術：巫術 23

客體化和省力化 28

自動化 33

第二章 新穎的文化現象 37

抽象性 37

實驗的思想方式的擴散 43

相反的趨勢：原始主義 52

技術思想模式的傳播 57

第三章 社會心理學的發現 61

適 應 61

對直接經驗的喪失 69

作為二年經驗的輿論 74

經驗與氣質 80

第四章 新主觀主義 89

經驗方式的改變 89

內部經驗與外部經驗之間的關係 97

小說與遊戲 101

第五章 世俗的視野 111

農業的道德和工業的道德 111

動盪和禁欲主義 118

第六章 文化發展中的危機 131

成熟文化的各種問題 131

某些反駁 134

一種新的文化開端 137

作為時代特徵的不確定性 140

第七章 社會心理學和心理分析 147

對弗洛伊德業績的幾點評論 147

弗洛伊德理論的社會心理用途 153

快樂原則與「暴露」原則 158

第八章 自動作用 165

行為的格式化 165

心理評估 170

專門化和教養 173

第九章 人 格 181

索 引 189

中譯本序

本書作者安諾德·蓋倫（Arnold Gehlen）是當代德國著名的社會哲學家，一生著作宏富，包括《人，他的本性和他在世界中的地位》、《原始人和晚期文化》、《時代的圖象》和若干文集。本書是從一個廣闊的歷史、社會與心理（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從德文所謂的哲學人類學）的視野來探討現代人和現代文化的諸多問題。因為中國介紹他的理論的尚不多見，現將此書譯為中文，以饗我國讀者。

人類在幾千年文明史的漫長過程之中，逐步形成了種種固定的社會制度、行為規範、思想模型與心態。然而近代社會和以往幾千年的傳統社會卻大為不同，它是一個工業化的、技術的社會，而工業和技術是日新月異的；於是人類就不得不告別以往基本上是穩態的、常規的社會，而步入一個急劇變化著的社會。隨之，人類以往備受尊敬的、習以為常的而且似乎是理所當然的種種制度、習俗、規範、思想、理論乃至感情和心態，也就被迫不斷地要改變自己去面迎這種日新月異的挑戰。但是人類文化生活在這些方面的改變，卻遠遠趕不上、而且適應不了工業技術的迅猛變化。現代人類文明社會的一切問題，一切矛盾和衝突，歸根結柢大都可以溯源於此。它不是人類文明某個方面（哲學的、藝

2 科技時代的心靈——工業社會的社會心理問題

術的、政治的、經濟的等等）的危機，而是整個人類文明座標系的危機。本書內容就環繞著這一中心論點而展開，作者在書中提出了不少自己獨特的見解。當然，對於這樣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我們不必期待任何一部著作——包括作者這部篇幅不大的簡明扼要的著作在內——能夠做出最後的答案。無論如何，現代化文明的內在矛盾，及其所造成的現代人的心理失調和靈魂中的陰影，乃是每一個人文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所無法迴避的問題。蓋倫的努力或許有助於學者們對這一問題做進一步的思考和探索。

書中的 modern 一詞（及其所衍生的 modernity 和 modernization）的涵義，包括中文的近代和現代；我們一律譯作「近代」，以期統一。在很多場合，它指的乃是現代（或者當代）。中譯文中的錯誤或不妥之處，我們衷心歡迎讀者的指正。

譯者

一九九〇年冬

譯案：1. 本書各頁左、右邊附加之數字為英譯本之頁碼供讀者對照閱讀。

2. 反白隨文註，如❶，為德文原著之註釋。

前言

vii

安諾德·蓋倫的書，第一個英譯本在他去世四年之後問世，這是一樁具有知性意義的事件。蓋倫的著作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德文版全集目前正由法蘭克福出版社維多里奧·克羅斯特曼 Vittorio Klostermann 出版，是由幾位曾與作者有過關係的學者，尤其是卡爾－西格貝特·雷堡 Karl-Siegbert Rehberg，精心編輯的）。從本世紀二十年代中葉至七十年代中葉，蓋倫是一位多產作家，雖說他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出名。他的著作在德語的社會科學界和哲學界深有影響，儘管也是頗有爭議的。某些爭議乃是蓋倫政治立場的結果，那立場對於歐洲知識分子們的正常標準來說是相當偏右的。幸而蓋倫作品中的根本假設和洞見，並不必然地與任何政治的或意識形態的立場相聯繫，即使是在德國，蓋倫也確實是影響了許多在政治上和他有尖銳分歧的人。對他著作的爭議多端可能多少和他那文風有關。蓋倫是位風格獨特的思想家。他寫作起來對於漫不經心的讀者是毫不客氣的，他經常寫得很尖刻，因而就需要費點氣力才能接觸到蓋倫的思想。當然，這種氣力是很值得花費的。

蓋倫著作的中心點是他有關制度的理論，最初是在若干篇廣泛的哲學文章中加以表述，後來就以越來越多的具體性而應用於

viii

當前世界中的大量社會問題。我們很可以把這一有關制度的理論看作就是社會學運用的本身。但是假如我們看不到它所由以成長的那些哲學根源的話，那麼它就會喪失它那大部分的份量了。這些根源在德文中被稱之為是屬於哲學人類學這門學科的，也就是說，是屬於對於人性的哲學反思。在蓋倫那裡，這一學科是和人類生物學的發現密切相聯繫著的。因而，撇開他的其他貢獻不談，蓋倫在社會理論和哲學與生物科學兩者之間建立了橋樑這件事，乃是極有意義的。

德國的哲學人類學有著悠久的歷史，可以上溯到赫德爾（中譯①）、黑格爾以及十九世紀黑格爾主義的修正（尤其是費爾巴哈、馬克思和尼采等人）。它的直接先行者則是現象學，特別是麥克斯·謝勒（中譯②）的晚期著作中把現象學的方法應用到哲學人類學上面。對蓋倫最有影響的生物學家是于克思庫爾（J. von Uexküll）、阿道爾夫·波特曼（中譯③）和邦騰狄克（中譯④）。第一次把這一生物學的工作有系統地用之於哲學人類學是由赫爾穆特·普萊斯奈（中譯⑤）做出的，他像蓋倫一樣，也是在哲學和生物學兩方面都訓練有素。普萊斯奈也是第一個發掘這一生物研究的社會學涵義的人（*Die Stufen des Organismus und der Mensch*《有機體的各個階段和人類》，1928年），但是他並沒有從中發揮出一套有關制度的理論。

ix 蓋倫的制度理論的生物學出發點是人在動物界中的特殊地位。上述的幾位生物學家全都強調 *Homo sapiens*（智人）與其最相近的哺乳類親屬相形之下的獨特性。順便可以提到，在這一點上他們和蓋倫一樣，既與生態學家（其中以康拉德·羅倫茨

爲首）（中譯⑥）也與目前的一批「社會生物學家」截然不同，社會生物學家是強調人和其他哺乳類動物的共同性。波特曼有關人類胎兒發育的著作在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他提出了人類有機體發育的根本步驟是在個體誕生以後才開始的，從而就使得唯有發育中的有機體才能接受有機體之外的環境的各種影響。人類有機體在誕生時「尚未完成的」特性，是和它那未經分化的本能結構密切相關的。人，和所有其他哺乳類動物都不一樣，是以「本能的貧乏」（Instinktarmut）爲其特徵的。因爲他的本能並沒有給他提供一個在其中可以活動的穩定結構，所以人就面對著一個「開放的世界」，換一種說法，人是以「世界的開放性」（Weltoffenheit）爲其特徵的。因此之故，人類的條件就是以極大的不穩定性爲其標誌。這些條件在生物學上（進而也就在心理學上）是無法容忍的。所以人類自身就必須以其自己的活動來建造出穩定結構。而社會制度便是「世界構造」這一活動的核心。

各種制度都是文化所產生的各種形式，人生就由此而被賦予了一貫性和連續性，填補了由於人的「本能的貧乏」所留下來的「空隙」。它們就緩解（Entlastung）了由於本能上沒有定向的各種衝動的積累而造成的緊張。它們對人生提供了一種穩定的背景。這意味著人生中制度化的那一部分可以看做是理所當然的，是自發和不假思索地在行動著。根據同樣的標誌，各種制度由於提供穩定的背景（Hintergrundserfüllung）也就爲有意的、有思想的、有目的的活動開闢了一個「前景」。

蓋倫哲學人類學的基本論述見於他的 *Der Mensch, seine*

Natur und seine Stellung in der Welt (《人，他的本性和他在世界中的地位》，1940年)一書(1950年做了重大的修訂)，其中已經勾劃出了他後來的制度理論。關於制度的普遍理論的最重要的論述，則是 *Urmensch und Spätkultur* (《原始人與晚期文化》1956年)一書。這部書也包含對遠古社會與近代社會之間的對比的詳盡探討，並引入了**非制度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這一關鍵的範疇。遠古的制度是包羅萬象而又高度穩定的，因而接近於生物學上本能的功能，結果，它們提供了強而有力的緩解作用(即上述那種意義的緩解)。近代性的「非制度化」，則在於它動搖了各種制度的穩定性，縮小了它們的範圍，從而就作為思考的合理性結果而採取的行動開闢了廣闊的前景。蓋倫對這些過程的分析是複雜而又精密的，而其關鍵性的洞見則是近代社會有種被嵌入的不穩定性的因素，它對於近代社會裡的人生每一個方面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本書包括把蓋倫有關制度的普遍理論最簡潔地應用於分析近代工業社會。它最初出版於一九四九年，題名為 *Sozialpsychologische Probleme in der industriellen Gesellschaft* (《工業社會的社會心理問題》)。本譯文是根據一九五七年的修訂版，它用了另一個(並不很恰當的)新題名 *Die Seele im technischen Zeitalter* (《技術時代裡的人類靈魂》)。修訂版為平裝本，在德國流傳甚廣；它或許是蓋倫最有影響的一部書。

xi 近代性的非制度化目前更直接地與近代社會特點有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由技術而來的各種特點。假如我們想要理解遠古的人是怎樣地被剝奪掉了他們穩定的制度，我們就必須首先求之於

近代技術及其所產生的各種形式（麥克斯·韋伯稱之為「理性化」）。但是本書的著重點，正如這兩個書名所提示的，在於近代制度的心理內涵。這裡的關鍵性的範疇，乃是**主體化**這一範疇。

遠古的制度是高度客觀的，也就是說，它們被人體驗到不可避免的、信賴得過的事實，有似於自然界的事實。近代制度相形之下則缺乏這種客體性。它們是容易被看作，並且確實被人體驗為是各種特別的構造，它們當下在此處是如此，而明天可能就成為過去；無論如何它們不能看作是理所當然的，而是隨時都可能發生根本改變的。近代的組織則是大大被稀釋了制度的典型形式（確實，蓋倫也懷疑在他的理論中所闡釋的意義上的制度一詞，在這裡究竟能不能適用）。描述這一過程的另一種方式——仍然用蓋倫的話來說——則是說，近代性大大地縮小了人生的背景而相應地擴大了其前景。所以近代性就是以不斷的創新、合理性和思考性，以及一種與之相應的對一切社會秩序的不可靠感和變化形態為其特徵的。然而，這種轉變並不只是某種在外部、在個人的意識之外所發生的事情。它也要作用於意識，而且是生死攸關地在起著作用。

其所以如此的原因，蓋倫的哲學人類學做了說明：當近代性已經大大改變了人的社會環境時，它並沒有改變人性。這如同一個生物學的 *Homo Sapiens*（智人）品種依然存在，並且必須與新的環境達成協議。然而，這卻是非常困難的。因為人在本能上始終是貧乏的，需要有穩定性和對行為的可靠的路標。如果社會不能給他造就這種穩定性，那麼他就必須多少要在自己的意識之

內去尋找這種穩定性了。說明這一點的，還有另一種方式如下：只要是近代性削減了社會秩序的客體性，它就 *ipso facto*（由於這一事實本身）而加重了人的主體性。這就是蓋倫所說的**主體化**，這是一場深刻的轉向內心的過程。這一過程乃是經常為人注意的、範圍廣闊的各種近代發展之人類學的和社會學的基礎——即近代哲學、文學和藝術之朝著主體性在轉向，以及是自律的個人及其權利這些理念的發展。可是，把這一過程看成僅僅是呈現在思想史上，例如呈現在個人主義之一種意識形態的歷史起源上，則是一種誤解。它不僅只是近代人認為自己具有非常之複雜的主體性而已；他的確在經驗上也有著這種主體性。於是主體化就不單純是思想領域裡的一場變化，而是在心理學領域裡的一場從經驗上說來是有效的變化。至少就這種程度而言，近代人乃是人類歷史上的一樁 *novum*（新事物）。

蓋倫在本書中對於心理分析的探討就澄清了這個問題。站在哲學人類學的水平上，蓋倫對弗洛伊德的理論必然是持批判態度的。但是站在近代人的社會心理學的立場上，他對於弗洛伊德的理論卻又有許多贊同的地方。它們事實上確實解說了近代人的種種特徵，那怕它們並沒有能解說人性本身。因而我們可以說，如果我們談到遠古的人，那麼「無意識」的存在就是值得懷疑的事。遠古的人對於「內」和「外」之間的關係和近代人有著十分不同的經驗。但是近代人也可以說具有一種「無意識」；但是這種新的收穫——假如我們可以這樣稱呼它的話——卻可以直接上溯到我們前面所提到的各個制度的秩序的轉化。遠古人有一種「特性」，一種相應於社會世界的可靠結構的堅強內心結構。而

近代人則有種「人格」，其流動而又不可靠，正有如近代性的非制度化的社會世界。這種人格非常之複雜，很難以統一，而且看來還包括有被弗洛伊德理論所揭示的那類茂盛的滋長物。

這並不是說近代人就可以根本不要任何的制度而生存（像是各家激進的新弗洛伊德學派十分合邏輯地所空想的那樣）。那是惟有假設人性本身改變了之後，才會有可能的；然而這一點卻沒有任何證據。倒不如說，近代世界產生了各種不斷在變化的准一制度（蓋倫也稱之為「次級的制度」），和大眾傳播的架構，使個人可以藉之向自己的生活裡注入某種程度的穩定性。心理分析本身以及由此而來的一切心理治療，都可以看作是屬於這一範疇的。這類准一制度的確向個人提供了某些支持，但是它們卻比遠古社會的各種制度脆弱得多，而且這種脆弱性是充分呈現於意識之前的。所以近代的個人都傾向於非常之神經質，就不足為奇了。以兩性關係這種人生中的基本組成部分為例，非人類的哺乳動物在這方面是沒有問題的，因為它們的生物體質就牢固地組成了它們的性衝動。而遠古的人也沒有嚴重的問題，因為他們的各種制度就可靠得足以使他們以高度的穩定性來組織他們的性衝動。相形之下，近代人卻被性問題，乃至被性的認同問題，給困擾了。這種混亂可以由心理治療、由大眾傳播媒體所散佈的性形象、甚至由傳播這種或那種「性生活方式」的崇拜和運動而得到緩解。雖則這些對問題還只是不完全的和暫時的解決辦法。因此個人就要頻繁地改變治療方法，在他們生活的一個方面遵循一種形象，在另一個方面又遵循另一種形象；他們在改變「性生活方式」，正有如他們在改變其他的消費嗜好那樣。

xiv

蓋倫對近代的主體性的分析，在他的其他著作中更加推進了一步。最有趣的一部書是他那部論現代藝術的 *Zeit-Bilder*（《時代的圖象》，1960年）。更進一步的發揮則可以見之於他的各卷文集：*Anthropologische Forschung*（《人類學研究》，1961年）、*Studien zur Anthropologie und Soziologie*（《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1963年），和蓋倫不太滿意的另一部作品 *Moral und Hypermoral*（《道德與超道德》，1969年）——此書大部分是對復興中的德國新馬克思主義進行論戰。目前次要的文獻在不斷增多，大部分是德文的。儘管蓋倫不能說是建立了某一學派，然而他的影響很廣並且在日益增長。

本書在我國（美國）的出版，將使說英語的社會科學家和其他人第一次直接接觸到一部扣人心弦的作品。出版來得很及時，至少在美國的社會科學界，目前比起前幾年的情況來，存在著一種更加多元化的形勢。各種正統都已經被削弱了，新的研究路數已博得了許多追隨者和人們的注意，對於創新性的離經叛道是更加開放了。蓋倫的思想出現在這種新形勢之下，具有著潛在的、影響深遠的種種可能性。

蓋倫有關制度的理論，以哲學人類學和人類生物學為基礎，很可能成為他的思想將吸引美國注意力的一個方面。近幾年來，有關「社會生物學家」所採取的新方向，曾經引起過一場猛烈的爭論。儘管有著它那過激的政治色彩，但是這場爭論不過是在重複著天性抑或教養這一悠久的老爭論而已。對這些問題，蓋倫提出了一種十分不同的新途徑，它植根於人類生物學，但同時又與任何一種形式的生物決定論截然有別。再者，蓋倫的理論對於所